

收稿日期:2024-02-11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工作论析

杜强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1943年,为解决政出多门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依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开始了以确立根据地各级党委对同级及以下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绝对领导权为核心要旨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工作。党委领导下一元领导体制的建立,既解决了根据地政出多门的问题,又使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积蓄了抗日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5-0016-07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安徽抗日根据地领导体制变迁研究”(AHSKQ2021D214)。

作者简介:杜强(1982—),男,河南信阳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5.056

全国抗战时期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对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领导和积蓄抗日力量的一项重要举措。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鄂豫边区)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对鄂豫边区的发展与巩固,推动中共中央实现在华中建立稳固根据地战略目标的实现均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学界无论对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整体研究,还是对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个案研究都显得不足。本文拟以相关资料为基础,深化相关研究,以期对新四军研究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有所裨益。

一、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背景与主要举措

鄂豫边区是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重点经略的八大战略区之一,地跨豫、鄂、皖、湘、赣五省交界,南扼长江,北依淮河,东临皖西,西屏秦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新四军在江淮河汉间对敌实行反攻的重要战略基地与前进阵地,也是坚持抗战,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妥协的一个重要堡垒”^{[1]450}。同时,此地也是国民党和日军欲占领的战略要地,但相比于长期拥有10~30万人的国民党军和8~9万人的日军的强势地位,巅峰时期也仅有5万人的新四军第5师^[2],

只有通过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积蓄一切抗日力量,方可在日、伪、顽的夹缝中立足与发展。因此,中共中央和鄂豫边区均意识到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具体到鄂豫边区的建设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依据中共中央要求确定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决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决定》(一般简称9月决定)。决定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等军政团体,“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3]20-21}。目的是使各级党委的权限由仅负责地方党务到全面领导党、政、军、民,以此确立党委的权威领导地位。据9月决定要求,1943年1月,鄂豫边区在蒋家楼子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边区党委对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1]286}。1943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指示鄂豫边区“根据中央九一决定,鄂中五师地区之党政军统一领导机关为鄂豫边区党委,以前之党政军委员会取消”^{[3]669},要求根据地的领导体制由党政军联席会议转变为边区党委全权领导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而且,面对国民党军围攻和日军“扫荡”的严酷形势,统一思想和领导权成为鄂豫边区“党、政、军负责人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4]255}。

第二,成立根据地各行政区域内的最高领导机构和最高领导集体。194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鄂豫边区,明确指出鄂豫边区党委为“五师地区之党政军统一领导机关”^{[3]669}。同时,中共中央要求鄂豫边区组建以李先念为边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新四军第5师副政治委员,陈少敏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核心领导团队,其中由李先念负责最终决策根据地的重大事务^{[3]673}。由李先念的职位和职权可知,鄂豫边区确立了边区党委的最高领导地位,从制度上消除了政出多门的隐患。与边区党委拥有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对应,鄂豫边区下辖的军区党委、县委、区委和乡保甲党支部分别实现了对应区域内同级及以下政府、军事组织和民众团体的绝对领导。

第三,厘清党委与政府及其他部门的领导关系。据九月决定,“中央代表机关及边(区)党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各]级委员,均需无条件执行”^{[3]21}。鄂豫边区党委针对军事、政府与民众团体作出的任何决议、决定与指示,新四军第5师、边区行政公署及所有民众团体均须无条件执行。而且,各级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工作内容、方针与路线必须在各级党委允许的范畴之内。历史表明,厘清党委与政府及其他部门的领导关系后,无论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民兵,还是边区公署、专署与基层政权以及各民众团体的发展,都迈进到一个新阶段,鄂豫边区的发展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转变。

第四,统一各系统干部思想,巩固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单从制度上确立党委领导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足以消除各部门间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封建主义倾向。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统一各部思想,是巩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重要措施。据鄂豫边区党委要求,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制定了全师1943年政治思想教育的目标,具体为全员在年度内必须学够政治课28小时、公开党课10小时、党的政策课18小时、思想意识教育课24小时、政治工作课24小时、情况教育课14小时^{[5]201-203}。经过一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全师上下均拥护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制度。另外,1943—1944年,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下的抗大十分校也通过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如第三期学员在校时,学员的首要任务即为加强政治学习,并规定学员的学习程序为先政治后其他,还要求政治考察是结业考试的核心内容^[6]。该校学员主要来源于党、政、军、文教系统的基层干部、国民教育中小学毕业生及社会青年,他们毕业后又大多成为根据地基层各系统的领导核心,这些干部人才成为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重要支持者与执行者。

一元领导体制下的党委的最高领导地位主要体现于党对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的政治指导,

不是以党代政、由政治主官代替军事主官的职权,取缔民众团体的自治权,而是在政治站位上紧跟党的步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的业务自主权。事实上,鄂豫边区党委在1943年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后,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的业务权力并未被削弱。以政府部门为例,1943年1月,面对1942年长达8个月之久的摩擦战造成的困局和春荒危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不仅制定了春耕生产紧急动员条例,还对兴修水利、农业生产资料管理、春耕过程作了详细规定,并申明条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边区行政公署^{[7]51-59}。县政府在一县范围内同样拥有最高行政管理权,如1945年1月和2月,黄安县(今红安县)县长代表县政府发布了此年该县投验白契^{[7]80}、增产与造林的训令^{[7]81}。

二、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主要特点

抗战时期,除中国共产党外,国内的几股主要政治势力均有强化所属政党统治力的举动。1943年,国民党企图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念强化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地位。与国民党以强化独裁统治为目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实施一元化领导“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3]25}。第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主要体现于党组织、党委领导人在同级机构和同级干部中的最高地位。首先,突出党组织的领导地位。由前文可知,为实现一元化领导,鄂豫边区首先确立了边区党委、军区党委、县委、区委等各级党组织在对应区域内的最高领导地位。其次,凸显党委领导人的核心领导地位。李先念以边区党委书记身份拥有对根据地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并兼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和政委,树立了边区党委书记的绝对权威,进而使政府首脑、军事干部维护党委干部的领导地位。此举的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杜绝出现类似于国民党集团之中军权凌驾于政府、党部之上的错误现象,另一方面,恪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政治红线。再次,通过党的绝对领导确保了根据地走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工作是根据地政治工作的核心,因而根据地的一切政治工作均源于党的决策。如鄂豫边区党委要求主力军队在开展敌伪工作时,均要以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规定的工作内容、方法、目标为准,不得任意改变,以保证党的敌伪政策能落到实处^{[5]233-234}。

第二,战时色彩鲜明。根据毛泽东在全国抗战爆发初期时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全党工作总要求,鄂豫边区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工作呈现出明显的战时色彩。首先,选择军事才能出众者为鄂豫边区党委的最高领导人。李先念早年便投身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并迅速成长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抗战爆发后又相继成为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和新四军第5师师长。当他请辞边区党委书记时,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坚持认为,“今后的主要的工作是军事工作,先念在军事上较强,只要能保障在军事上不犯大错,难关很容易渡过的,故书记仍以先念为宜”^{[3]673}。除李先念外,鄂豫边区党委常委中的任质斌和陈少敏也是军事才能出众的干部。其次,各级政府的工作范围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而逐渐扩大。1943年初,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实控范围主要集中于鄂中、鄂东和鄂南三块区域。随着新四军第5师的顺利进军,1945年8月其管辖范围最终扩展为“东起安徽宿松、太湖和江西彭泽,西至湖北宜昌、当阳、荆门,北界河南舞阳、叶县,南临湖南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在鄂豫皖湘赣省交界区的多个县内”的广大区域^{[1]1}。再次,加强部队的发展与建设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目标之一。国民党顽军1942年的大围攻和日伪军的大“扫荡”,导致鄂豫边区人口减少、粮食减产、财政缩减。因此,鄂豫边区党委指出,“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1943年,鄂豫边区在新四军第5师前两年正规化建设的基础上,分别以旅、军分区与抗大分校为单位,开展大规模的扩军运动和军事整训工作,“(蒋家楼子)会(议)后,李先念和边区党委又组织各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全面实施1943年的军事建设计划,

在全边区广泛深入开展军事政策宣传与扩军运动。为了充实主力部队,除主要依靠地方党员群众参军和地方军升级外,还在淮河以南、信(阳)罗(山)公路以北的淮南地区进行了大扩军”^[8]。扩军意味着脱产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在人力、物力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打击削弱的情况下还能抽调青壮年人口参军,充分表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对加强军事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重视拥政爱民。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后,鄂豫边区党委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分重视拥政爱民工作。1943年5月,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李先念要求各级党委和新四军第5师以下辖机关和连队为单位,“纷纷召开军民座谈会和党政联席会,听取党政机关和群众对部队的意见,举行拥政爱民公约宣誓,要求指战员爱护民众像爱护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政府像尊重部队领导一样,服从政府法令像服从部队命令一样”^{[4]266-267}。194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鄂豫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月的决定》,明令每年正月为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月。随后,各项拥政爱民工作迅速在鄂豫边区开展起来,如1944年“春节期间,第五师各部队为驻地百姓开展了洒扫庭院,劈柴担水,召开军民联欢会,请房东聚餐,给群众送春联、拜年等。各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杀猪宰羊,做年糕,组织劳军活动”^{[4]267}。

第四,在实践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抗战时期,鄂豫边区各级党委面临诸多问题,尤其是身兼第五师师长、政委的李先念,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鄂豫边区党委向上级提出了派员充实领导班子的申请,“1943年春,战斗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李先念和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等向中共中央去电,请求中央派干部来鄂豫边区加强领导”^[9]。中共中央根据鄂豫边区领导层的实际情况,决定委派曾长期开展大别山革命斗争、又担任过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军事政治能力均较强的郑位三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充实到鄂豫边区的领导层。郑位三到任后,帮助鄂豫边区确定了“以巩固为主”的政治方针,对鄂豫边区军政力量的发展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10]。而且,郑位三虽代表中共中央中原局参与鄂豫边区的领导工作,但其并未改变原领导班子成员,既保留了前期建设成果,又加充实了领导集体,鄂豫边区的一元领导体制建设进一步走向完善。

三、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历史作用与当代启示

(一)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历史作用

蒋家楼子会议决议组建的以李先念为书记,任质斌、陈少敏为骨干成员的鄂豫边区党委,对鄂豫边区的发展壮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领导班子,是一个坚强的集体,他使鄂豫边区以后的胜利发展和巩固有了关键性的保证”^{[1]287}。由此可见,鄂豫边区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于党建成就和根据地发展两方面。

第一,党领导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结束了鄂豫边区此前由于党政军之间领导关系不明确而引发的政出多门现象。在实施一元化领导前,鄂豫边区存在政出多门问题。1939—1942年,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主要负责地方党务工作,新四军第5师师长、政治委员李先念负责军事工作,鄂豫边区行政公署主席许子威负责政府工作。尽管党政军之间均以大局为重,彼此竭力团结合作,但因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还是导致鄂豫边区出现了政出多门现象。客观上,新四军第5师师部驻鄂东大悟山,边区党委主要驻扎于鄂中小焕岭,边区行政公署也不能长期随师部或党委行动,加上党政军之间常态化的音讯不通,致使党政军之间出现了命令不统一的情况。主观上,党政军各有一套运行机制,在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时,因彼此之间相对的独立性,限制了鄂豫边区对重大事务的统一决策权。此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机构鄂豫边区党委的实际权限基本被

限制在管理地方党务的范畴内。1943年,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使鄂豫边区的最高决策权统一归于鄂豫边区党委,而政府和军队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和同级党委的指示、命令和决议。不仅如此,党委领导兼任军事职务解决了以往党、军驻地不一引发的二者行动不统一的难题。李先念以鄂豫边区党委书记身份兼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和政委后,党委对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实际出自于一人,从根本上消除了军队不服从党委命令的风险。

第二,推动鄂豫边区快速发展。一元化领导体制确立后,鄂豫边区党委的领导使根据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最终扩大为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的大型抗日根据地。

首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稳步发展,军事体系臻于成熟。新四军第5师的三个主力旅通过在各自军分区内开展扩军与整训工作,使部队人数显著增加,部队质量明显提升。1943年,新四军第5师的主力部队扩军超过1万人,全师达到4万人,装备的改善和战斗力的增强,表明部队的整体质量得到了提升。如该师第13旅的第37团、38团、39团和特务团,“各有一千左右,武器较全,经常靠近师部,为全师机动部队。这些部队作战能力强,战斗情绪高,善于长途行军和野战攻坚”^{[11]53-56}。地方部队也在军区党委领导下逐步走向正规化,同建制兵员人数与主力部队大体相当,军事训练按正规部队标准进行,装备质量按主力部队标准配发,因此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如第四军分区的第11团、第16团、第17团、第40团、第41团都是擅长打攻坚战强悍部队^{[11]56}。此外,实施一元化领导后,由鄂豫边区党委及以下各级党委直接领导民兵建设,使民兵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之间形成了可以彼此补充、转化与相互促进的“三位一体”军事体制。

其次,一元化领导体制建立后,鄂豫边区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工作在困境中稳步突破。以1944年为例:其一,开拓土地和增加人口。鄂豫边区在战斗最激烈的抗日前线扩大了5万平方华里的土地,人口增加了150万,基本收复了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丢失的豫中南地区平汉铁路沿线的国土。其二,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1944年6月,据鄂豫边区党委要求召开的鄂豫边区第一次临时参议会,决议通过了多项法令、议案,民主选举了新一届行署委员,成立了驻会委员会,使民主政治建设工作常态化进行。同期,县级参议会为民众开展民主政治教育,选举县长,审核政府预决算,制定本县施政方略,颁布单行法规,监督行政与执法人员。其三,普遍开展救灾与生产节约工作。各级党委通过支持各级政府、临时参议会成立各类救灾、合作组织,基本化解了以往一直存在的水利、粮食、债务与反贪污纠纷。其四,努力突破经济建设困境。为突破国民党顽军和日军的封锁,贯彻执行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对鄂豫边区克服财政困难救济灾荒指示鄂豫区党委》的指示,鄂豫边区各级政府积极发展农业经济,仅兴修水利一项,据鄂中鄂东12个县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全年挖塘7790个、挖堰78个、筑坝1096条、筑堤2287条、开沟129条,做工近140万个,可灌溉耕地53万余亩^[12]。

单从数据上看这些成绩并不比实施一元化领导前有明显突出之处,但1943年后鄂豫边区的生存环境比前几年更恶劣。一方面,国民党第五战区1942年“剿灭”鄂豫边区的企图失败后,国民政府更是调集各派军队常态化发动军事摩擦,暗杀鄂豫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利用反动地主、特务甚至勾结日伪势力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扰乱根据地之前相对安定的基层环境,这无疑都加剧了根据地建设的难度。另一方面,为保护平汉铁路信阳至长沙段和武汉周边沦陷区交通网的安全,保障其所谓大陆交通线的安全,日军于1944年多次发动针对鄂豫边区的大“扫荡”,对根据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由此可见,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下的1944年根据地建设成果的取得实为不易。

最后,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带动了群众工作走向正规化。实施一元化领导之前,鄂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基本处于建立组织与扩充人员的初级发展阶段,总体上缺乏一个纲领性的发展规划,正

规范化建设效果不明显。实施一元化领导后,鄂豫边区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的策略、章程与方针。1943年10月,鄂豫边区党委民政部首先重点宣传了由群众组织负责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随之制定了规范群众组织开展生产运动的方法与策略^{[18]251-285}。1944年2月,鄂豫边区党委发布了要求各级党委在秋收前组织由200万人参加的民众组织工作的原则、方法、中心任务的总方针,同时指出党委虽不能公开干涉群众团体的具体工作,但要坚决避免其脱离党的领导^{[18]184-195},此方针事实上成为领导群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使鄂豫边区的群众工作走向了正规化。

(二)鄂豫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的当代启示

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在于挖掘历史的镜鉴价值,在以史为鉴中探索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代启示意义。

1.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

鄂豫边区建立的由党委领导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党的抗日伟业和在华中建立稳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建设事业,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完全胜利。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方可顺利推进。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伟大政党。当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建成了小康社会,顶住了外部压力,克服了内部困难,人民生活经济、教育、社保、医疗领域得到全方位改善。可见,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2.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

鄂豫边区实施一元化领导后,十分注重党的建设,以确保边区各级党组织的思想与行动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通过党建工作,鄂豫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实现了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组织严密的建设目标。当今,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因此,加强党的党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上的党建工作与新时代党建工作一脉相承,因而总结鄂豫边区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发挥其镜鉴价值,对当下全面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必将有所裨益。

3. 坚持走政治建军之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鄂豫边区党委通过提升政治干部地位、把党支部建到连队、加强政治教育和实现全员参加政治学习等策略,提升了部队的政治素质,新四军第5师因而成为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对抗日伪军和反摩擦的党的正规化军队。当今,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下,依然爆发了巴以冲突、俄乌战争,说明拥有一支对党绝对忠诚、现代化程度高的人民军队,方能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而建立一支不败之师的必由之路是走政治强军之路。无论是抗日战时期还是当下,中国共产党都注重通过提高部队政治素养的方式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故而,鄂豫边区实施一元化领导体制后的政治强军策略对当下的政治建军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 [2] 杜强. 中共反摩擦政策调整与新四军反摩擦斗争策略的演变:以新四军第5师为中心[J]. 军事历史研究,2022

(5):74-83.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3)[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4.
- [4] 张肇俊,张军. 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 [5]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M]. 1984.
- [6]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M]. 1984:47-55.
- [7]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M]. 1985.
- [8] 朱玉. 李先念传(1909—1949)[M]. 北京:军事文献出版社,1991:446.
- [9] 刘光明. 郑位三传记[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4.
- [10] 郭洋. 中共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以巩固为中心”发展方针述论(1944—1945)[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28-34.
- [11] 李先念. 李先念文选(1935—1988)[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2]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213-214.
- [13]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6辑[M]. 1985.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fied Leadership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s in the Hubei Henan Border Region

DU Qia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In 1943, in order to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caused by multi-leadership, the unified leadership has been constructed with the CPC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over the government, army, and mass organizations at the same level or below,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s in the Hubei Henan border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t has effectively addressed the chaotic administration, unified the leadership of various branches, consolidated the bases, expanded the liberated area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Hubei Henan border region; unified leadership; the CPC; the Anti-Japanese war

〔责任编辑:朱 根〕